

外国著名军事著作

总体战

Heute in dem totalen Kriege ist das Volk und mit ihm es selbst in die vorderste Linie gerückt, es ist zugleich die Bedeutung der Volksseele für die Erhaltung des Volkes in seinem täglichen Leben und erst recht in seiner Todesnot erkannt worden. Gewiß geht es im totalen Kriege auch um die Erhaltung des Staates, die ^德 von der Erhaltung eines freien Volkes ^{魯登道夫} nicht zu trennen ist, aber im totalen Kriege führt schließlich nicht der Staat, sondern das „Volk“.

解放军出版社

总体战

〔德〕E·鲁登道夫 著

戴耀先 译

解放军出版社

General Ludendorff
Der totale Krieg
Ludendorffs Verlag G.m.b.H., München
根据德国慕尼黑鲁登道夫出版社1936年德文版本译出

总 体 战
〔德〕鲁登道夫 著
戴耀先 译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85 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065-0680-7/E·349
定价: 2.00元

出版说明

在世界几千年的文化史、学术史中,军事著作占有十分明显的地位。它们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具有的学术价值,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国防进程中,有选择地翻译出版一些外国军事名著,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基于这种目的,我们将选择一些外国古代、近代和当代具有定评的军事代表作品,编成《外国著名军事著作》丛书,陆续出版。

这些著作,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影响,或多或少存在着糟粕,希望读者在研读时加以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

为出好这套丛书,深望著译界鼎力襄助。

译者的话

《总体战》一书的作者埃里希·鲁登道夫系德国将军，生于1865年，卒于193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先后任西线第2集团军司令部军需长（相当于副参谋长，负责后勤）、东线第8集团军参谋长、东线德军参谋长，指挥了坦嫩贝格（旧译坦能堡）和马祖里湖会战，取得了以弱胜强的重大胜利。1916年8月升任德国最高统帅部第一总军需长（相当于副总参谋长，负责作战），成为德国国防军中仅次于兴登堡的第二号人物和战争的实际指挥者。一次大战中，他负责实施了“兴登堡计划”和“辅助勤务法”，对全体德国人民和全国经济进行了总动员，可以说这是他的“总体战”思想的一次实践。

鲁登道夫一生撰写了多部著作，但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的是他于1935年撰写出版的《总体战》一书。后人对该书评价不一，但贬多褒少。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历史学者一般对该书持否定态度，认为《总体战》是“加速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书籍”，是“构成德国法西斯军事学说的重要基础之一”。

应当承认，从政治上说，鲁登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军

事家；反动的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战争狂热在书中均有鲜明的反映。但译者认为，从学术角度看，《总体战》不失为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书。

很久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总体战”似乎是一种法西斯、侵略者所特有的、与无产阶级军事学说格格不入的反动理论。这是一种误解。其原因在于，由于鲁登道夫《总体战》一书的出版才使“总体战”正式成为一种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被希特勒全面付诸实践。译者认为，“总体战”思想的基本要素并非由帝国主义发明和固有，而是由人民所创造，世界所共有。如果说，“总体战”的核心是动员全民力量——军队的和人民的力量，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参战，那么，最早对这些核心要素进行精辟中肯论述的，要算世界第一本最重要的兵书《孙子》。在孙武之后，鲁登道夫之前，或多或少，或深或浅论及这些问题的军事理论家也大有人在。在实际作战指挥中，古今中外的将帅们对这些问题无不给以极大关注，只不过有解决好坏之分而已。尽管如此，《总体战》毕竟是第一本集中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其价值不言自明。读者可以透过作者逻辑性不甚强的论述，某些章节中的玄虚说教和自我吹嘘，看到作者是如何认识这些直接关系战争胜负的重大问题的，可以提炼出不少对研究未来战争和今天的国防建设富于教益的观点。

自1916年鲁登道夫到德国最高统帅部任职后，不仅指

挥作战，而且插手政治，涉足经济，至使当时德国出现“鲁登道夫独裁”的说法。正因为如此，《总体战》作为鲁登道夫的代表作，其价值非同一般。由于作者是站在实践者的角度和战争指导者的高度来谈论战争，因此他的论述显得更通俗实在一些，在一些维系战争成败的重大问题上论述得更集中具体一些，使《总体战》在德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据了一定位置。它对于我们研究德国历史和德国军事思想史，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略思想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军事技术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参战人数之多、武器装备之先进是史无前例的，是历史长链中的重要一环。《总体战》作为鲁登道夫对一次大战的反思和总结，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总结，对我们研究一次大战，了解历史的进程也是一本很有裨益的参考书。

当然，作者作为一次大战主要策源国的主要军事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要求他不仇视社会主义革命，不仇视劳动人民，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肯定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之后，还必须看到它在政治上的消极的一面。为使读者不会产生断章取义之感，译者将全书译出，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注意鉴别，汲取精华，为我所用。

译文不妥处，敬请各界专家、学者指正。

1988年4月

目 录

第一章	总体战的本质	(1)
第二章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 战的基础	(13)
第三章	经济与总体战	(35)
第四章	军队的兵力及其内涵	(58)
第五章	军队的编成及其使用	(74)
第六章	总体战的实施	(98)
第七章	统帅	(119)

第一章 总体战的本质

我并不想撰写一本战争理论的书。战争理论对我是陌生的。我早已多次说过，我是一切理论的敌人。战争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一个民族生活中最为严肃的现实。我要讲的正是这个问题，但并不准备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东西；此书是写给人民和人民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因此我将深入论述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所不熟悉的方方面面。人民必须了解民族生存斗争的本质。他们得到这些知识，并不需要借助浩瀚的战争教科书，而是要通过简明易懂的解说。我在这方面所讲述的东西，是我个人的、最为重要的战争经验，并非象国外可能臆断的那样，是什么官方言论。

大约一百年前，战争理论大师冯·克劳塞维茨根据弗里德里希大帝（旧译腓特烈大帝——译者）和拿破仑时代的战争经验，写成了《战争论》一书。书中认为，战争是一个国家迫使另一个国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暴力行为。这是完全正确的。在研究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时，他只考虑了通过会战和战斗歼灭敌人的武装力量。这成了进行战争的毋庸置疑的原则，也成了总体战领导者的首要任务。因此，克劳塞维茨关于在战场上歼灭敌人的思想，

将永远具有深远的意义。冯·施利芬伯爵将军在 1905 年《战争论》再版前言中,对克劳塞维茨的这一思想作了中肯贴切的阐述。对此,我只能表示赞同。但从另一方面说,这部著作是过去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已远远落后于今天,甚至可以说,克劳塞维茨的研究成果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将人们引入歧途。

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关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关于“战争的多种多样性”,他写道: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同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越加一致,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反之,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因而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同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来就越是政治的。”

紧接着,克劳塞维茨又进一步分析了形成战争新的特性的原因:

“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

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在克劳塞维茨那个时代，国家首脑不顾人民的意愿而发动的所谓“内阁战争”，也就是政府以其军队进行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时所谓人民参预战事，一般只是交纳税款，或是由于军队的行军、宿营和作战而直接受到伤害。法国革命把完全有别于过去的一种力量，即人民力量置于战场之上，但当时的战争还没有从根本上形成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抽象的”或“纯粹的”形态。1866年和1870—1871年的战争，尽管在甘必大^①领导下，在法国呈现出一派活力，并得到全民族的同情，但仍没有阐明战争的本质。而这种战争形式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我不能不说，1870—1871年战争的德国领导者对于当时在法国出现的这种新现象茫然不知所措。在德国，战争始终只是军队的事。此时的战争还没有超出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性的学说。世界大战^②与近一百五十年的所有战争相比，表现出完全另一种特征。不仅各参战国的军队在相互厮杀，竭力毁灭对方，而且人民也在为战争效力。于是，战争矛头也指向人民，也使人民遭受深重灾难。对这场战争，

①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左翼领袖，1870年9月革命后任“国防政府”内政部长。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甘必大领导有民众参加的所谓新军进行军事抵抗，击溃了包围巴黎的普军。——译者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译者

我在《我的战争回忆》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尽管武装力量和作战兵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了，但陆军和海军的作战仍一如既往。然而另一方面，人民倾其全力作军队的后盾，给军队以鼓舞和支持，这一特点比近年的所有战争都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当前的战争中，哪些属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人民的范围，已难以区分。军队和人民已融为一体。人民战争真正体现出它的字面涵义。世界强国正以这种汇集起来的力量相互对垒。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与敌军作战的同时，也需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总体战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政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犹太民族和罗马教廷日渐突出的争霸斗争，以及削弱各民族和镇压反抗者的勃勃野心——而且还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而实行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及使用杀伤力日益增强的武器装备。战争的多种多样性时代已成为过去，而总体战却随着技术手段的改善广泛深入人们的生活：由于飞机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不但可投掷各种炸弹，而且可向居民散布传单和其他宣传品；由于无线电设备性能的改善和数量的增加，可向敌方进行宣传。此类变化多种多样，不一而足。世界大战中，敌军作战区域纵深的正面已扩展到数百公里宽，至使这些地区的

居民全部被卷入战争。因此，今天的所谓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不仅军队，而且人民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承受着战争行动的苦痛，而且受着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间接影响，尤如战史中所描述的被围要塞的居民，最后由于战争的折磨和生活所迫，不得不弃城归降。因此说，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这是无情的和确凿的现实，而且必将使用各种作战手段为这一现实服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一谚语，用在总体战中是再合适不过了。这就给总体战所有参战国的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负担^①。只有当整个民族的生存真正受到威胁，全民决心投入战争时，总体战才能付诸实施。这一特性是由总体战本质所决定的。统治者不顾人民的意愿，以及为达到有限的政治目的而发动的战争，已经成为过去。这种战争与其说同总体战一样是维护民族生存的道义之争，倒不如说纯属强盗行为。在“殖民战争”中，侵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个民族或部族消灭，于是被侵略者便为其生存奋起而战。对于那个民族或部族来说，这种战争便具有总体战的性质，他们是出于道义上的理由而战。除去这一点之外，可以说这种战争是最不道德的行为，根本不能冠之以“战争”这个

① 所有裁军会议都是违反神圣的民族自卫准则的，势必毫无成果。
消除犹太和罗马帝国主义，唤起民族觉醒，有助于和平的取得。

崇高、庄重的称呼。这种战争完全出于利欲，而不是为维护民族生存而发起的^①。

根据对总体战特性的分析，必然会得出意义深远的结论。

自克劳塞维茨至今的一百多年，战争的本质已发生变化，政治和战争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而政治本身想必是首先发生了变化。结合上述《战争论》的引文，我已经指出，克劳塞维茨在他那个时代是如何看待政治与战争的关系的。当时，他只看到了处理国家相互关系、宣战和媾和的所谓对外政策，而对另外一种“政治”却根本未加考虑。他把这种对外政策的意义看得远比战争的意义重要。他认为战争和战争指挥是紧密依赖于对外政策的，尽管他对战争指挥即统帅也给予了一定评价。

为了更好地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路，我再从他的《战争论》一书中引述下面这段话：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

① 在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欧洲领土上对德国人民所进行的战争，便具有殖民战争的特性。他们认为金钱可以拯救世界资本家。

这样要求,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仍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在另一段,克劳塞维茨说: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也许克劳塞维茨自己也对这种过分注重外交政策的观点产生怀疑。克劳塞维茨在另一处认为,这不仅关系到外交政策,而且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全部政策,尽管他没有触及事情的本质。他写道:

“这种情况(即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经常不断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进行政治交往”不仅要了解战争本质,以使对外政策符合作战的需要,而且首先要了解由战争本质派生出哪些与民族生存各个领域有关的任务,留待全民族的领导者即政治去完成。重要的一点是,对这个问题,不仅政治家

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要作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加以精心维护，使之代代相传。

政府、官员和人民乃至许多军官，在世界大战前和大战中囿于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对这个重要现实知之甚少。政府及其官员不懂得已经给他们即政治提出了全新的任务，人民也不懂得战争正向和将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世界大战中，政治本应至少促进人民活力的充分施展，为人民的生活形态服务。而人民也必须团结一致，为军队竭尽全力，甚至献出生命。我在我的战争回忆录中，阐述了人民的这种生活形态和这种政治所依据的基础。我认为，应特别强调民族的精神力量，它是战争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这一点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却丝毫没有论及。关于这一点，我在吕蒂希作战的头几天就感受颇深：

“这场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向我们德国人提出了非同寻常的要求，给德国人造成沉重负担。要想赢得这场战争，每个人都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我们必须理解世界大战和人民战争这个词汇的真正涵义，必须将生活的困苦和敌人向我们发动的表面不易觉察、但实际却具有巨大威力的宣传攻势置之度外，战斗和工作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汗，永远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必胜信念。这是一个严酷、然而又是绝对必要的要求。

“陆军和海军，如同德国土地上的橡树一样，扎根于祖国。他们靠国土生存，从中汲取力量。他们能够得到，

但不能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只有依靠家乡给予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以及人员补充才能战斗。陆军和海军正是靠着这支力量的支持，在战争的千辛万苦中去争取胜利，去英勇献身，去忘我奋战。有这样的军队就能够保障德国的最后胜利。祖国正是依靠这支军队，进行着这场对整个世界的巨人战争。至于盟国的援助，以及根据陆战法对被占领土地的资源利用，皆属次要因素。

“陆军和海军必须不断从祖国获取新的精神活力、人员和作战物资，并藉此保持其战斗力。

“国内的精神状态和战斗意志必须坚不可摧，如若遭受损伤，必将大祸临头！战争时间越长，这种危险就越大，困难也就越多，同时对增强陆、海军的精神和道德力量的要求也就显得越发急迫。

“祖国必须在人员和物质力量上为作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今天，我认为还要增加精神力量）。

“这对后方来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后方不仅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国防力量的生存根基——不允许出现任何裂痕；而且是纯洁丰盈的力量源泉——必须保持久盛不衰。惟有如此，才能使陆、海军的精神坚如钢铁，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人民内部需要强大，仅这一点就能给军队以源源不断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力量已水乳交融，无法分开。军队在前线的战斗力完全取决于国内人民的战斗力。在国内出现了一种为战争而工作和生活 的局